

唐五代传奇集

李格非 吴志达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唐人传奇，就是唐代的文言小说，它与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两枝奇葩。宋人洪迈称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¹⁾。鲁迅也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²⁾唐人传奇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它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如何？它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又怎样？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探讨的。编选这部唐代文言小说集，就是想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当然也为广大小说爱好者提供审美的对象。

—

从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演变的内部规律来看，到了唐代，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在《文言小说——先秦至六朝卷》的《前言》中，曾论及古小说的渊源，这里无须赘述。对唐人传奇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六朝志怪小说。描写神仙方术、鬼怪变异之类的作品，大体上是沿袭《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传说，而在新的社会土壤中有所发展。一般来说，六朝志怪小说，故事情节都较简单，但是某些来自民间传说或带有别传性质的作品，如《三王墓》、《李寄》、《汉武帝内传》、《阳羨书生》

以及《神仙传》中的一些作品，情节离奇曲折，结构相当完整，并开始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象《周处斩蛟》还能写出人物性格的转变，许多作品都富于浪漫性的想象，某些细节描写也较真实生动，语言大都较精炼，实际上已经开了有意为小说的端绪，为唐人传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唐人传奇的题材，固然大都来源于现实社会与人生，但也有不少志怪性的传奇作品，其题材可以看到六朝志怪小说的痕迹。

六朝的志人小说，在题材、主题和浪漫性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不象志怪小说那样对唐人传奇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记事传人的艺术技巧上，也为唐传奇积累了某些经验。特别是在题材上突破志怪的局限性，写作目的和手法上，不仅着重认识作用，更注意文学作品“赏心娱乐”的价值，这对于唐人传奇作者更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提高小说艺术水平，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史传文学给与唐人传奇以丰富的滋养。从先秦两汉至六朝的史传文学，无论是以编年记事为主的《左传》，以记言为主的《战国策》，还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虽然不是小说，但这些史书的文学意味很浓，对人物的描绘、故事的叙述，带有小说成份，能引人入胜。尤其是介于正史与小说之间的野史杂传，描写人物的细致生动，结构的严谨完整、富于波澜，对于唐人传奇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叙述战争见长的《左传》，很善于在描写战争过程中刻画各种人物的性格，《战国策》则善于在记言中表现人物细微的动作和精神面貌，而《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对情节的巧妙安排，人物形象的精细描写，更富于小说的艺术魅力。在《太平广记》中列为“豪侠”类及“杂传记”类的唐人传奇，从表现形式上来说，与《史记》等正史传记颇为相似，故事

性较强，首尾都很完整，开始先把人物家世、生平甚至外貌特征作简要交代，然后展开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情节曲折，叙述生动，而结尾往往在评论中表明作者的思想倾向。如果我们把《史记》中的《游侠列传》或《刺客列传》，与唐人传奇《冯燕》、《虬髯客传》等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吴保安》既是唐人传奇的名篇，又是正史《新唐书·忠义传》中的一篇人物传记。

传奇小说得以在唐代繁荣兴盛，也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某些制度的原因。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尽管唐人传奇的繁盛时期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但是它与初、盛唐时期奠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我在一个小册子中⁽³⁾，曾论及与唐人传奇关系较为密切的，政治上的一大因素，是统治阶级内部旧士族与新贵族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只是与唐人传奇中某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有关，而不能说是促进传奇小说发展的因素之一。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产生象《红线传》、《车中女子》、《贾人妻》、《虬髯客传》以及《聂隐娘》、《昆仑奴》等大量豪侠小说，是与“安史之乱”以后，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分不开的。地方强镇，既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闹分裂，也发动吞并邻镇的战争，国家残破，人民涂炭。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除了被迫揭竿而起以外，也希望有神奇的豪侠能制止藩镇的跋扈，维护王朝的统一，解除人民局部的苦难。这正是促使传奇中豪侠小说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

传奇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其所以能够兴盛，甚至可以同唐诗并列为“一代之奇”，这与唐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

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有着重要的关系。初、盛唐之际，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发达。“安史之乱”虽然造成巨大的破坏，但由于两税法的施行，庄园经济的勃兴，手工业和商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原来以河北定州一带为中心的丝织业，技艺传播到江东，蜀锦的织制也更精致。据说传奇小说《东城老父传》中提到的“白叠布”、《夏侯孜》中说的“桂管布”，就是棉布，可见纺织业发达的水平。造船业也有很大的进步，江南民间营造载重万石的大船。《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

手工业的发达，势必促进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扬州、杭州、成都，都是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富商大贾，富埒王侯。长安富商王酒胡，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又助钱十万贯修安国寺。随着商业的发展，供商旅所需的旅店、柜坊（钱庄）、飞钱或便换（汇款）行业，都出现了。《续玄怪录·张老》写张老送给妻舅韦义方一个旧草帽，凭此帽可到扬州王老家取钱一千万，虽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其实正是现实社会中“便换”的反映。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形成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富商的势力很大。封建社会里的大商人，往往也是封建地主，但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又与一般豪门地主不同，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不完全受传统的封建思想所束缚，政治上和文化上也有自己的要求，对封建门阀制度自然抱反对的态度。中下层市民的思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些情况，也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反

映，而传奇小说比传统的诗文，更适合这种需要。这也是促进传奇小说兴盛的一个原因。

与传奇小说的兴盛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是唐代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的环境。唐代的社会思潮是较为复杂的，但人们的思想也是相当解放的，整个文化艺术的环境气氛，生动活泼、宽松和谐、自由舒畅。社会上儒、佛、道三家思想都很盛行。作为哲学流派的道家，早就有之，东汉时兴起的一种宗教——道教，却追尊老子为教祖，南北朝时道教的影响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因皇帝姓李，与道教的教祖老子李耳同姓，于是道教便为唐朝皇帝大力提倡，高祖为老子立庙，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亲注《道德经》。由于尊崇道教，道士女冠在法律上还享有特权，犯了罪，地方官不得擅行决罚。统治者一提倡，社会上信道教就成了风气。建道观、崇道徒、合药炼丹，妄想长生不老，飞升成仙。这种崇道的社会思潮和风尚，对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较大，求仙问道之作不少。

对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佛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经三国、南北朝、隋朝，流传很广。唐朝统治者虽崇道，但佛教作为一种精神统治的工具，统治者也予以提倡。高僧玄奘于贞观年间去印度，取回大量佛经，在长安专门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唐太宗还亲自为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继玄奘之后，义净又去印度留学，回国后在洛阳译经。这对佛教的广为流传，具有很大作用。武则天出于政治的需要，大力提倡佛教，以取得佛教徒对自己的支持。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特别是市民对佛教的拥护，从中唐以后，以宣扬佛教故事为主的说唱变文兴盛起来了。佛教文学对传奇小说不但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体裁、结构上的影响都很明显。佛教讲经（“僧讲”）

和民间说唱变文(“俗讲”)的繁荣时期,恰好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受佛教文学影响是主要原因之一。就内容而言,佛教故事为传奇小说提供了一部分题材,例如《大唐西域记》卷七关于“烈士池”的记载,便是传奇小说《杜子春传》的故事来源。至于佛、道思想对传奇作品的渗透,更是不胜枚举,《长恨歌传》就兼有这两种思想的影响。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类佛家观念,在唐人传奇中相当普遍。在艺术表现上,受佛教文学和民间故事的影响,想象力更为丰富,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天上人间,千变万化,广阔无垠,奇妙多采。在文字语言方面,译经重在散文的平易、准确、具体、生动,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象韩愈、柳宗元这样的古文家,也写起传奇小说来,既说明译经散文对古文家的启示,更说明它为传奇小说在语言艺术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佛经散韵结合的体裁,对传奇小说的结构形式也有影响。很多传奇作品都间杂着韵文的成份。

传奇小说之兴盛,与“古文运动”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古文是与骈文相对而言的,提倡古代那种生动活泼、朴实晓畅、富于表现力的散文,反对六朝萎靡绮丽的文风。初唐陈子昂倡导古文运动,而贾至、独孤及等人推行其主张,到了韩愈、柳宗元则形成盛极一时的运动,取得丰硕的成果。古文运动兴盛之时,也正是传奇小说最繁荣的时候。可以说“古文运动”为传奇小说的繁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传奇小说的成就,则显示了“古文运动”在当时的生命力。古文大师,几乎都是名盛一时的传奇小说家。韩愈虽以卫道著称,但他的思想却是相当解放的。他以古文创作传奇,曾遭到非议,而他和柳宗元极力为之辩护,理直气壮地为传奇小说争得在文坛上的地位。这是由思想的解放,推动文学的变革。他们与张籍的论战,充分表现了他们作为一代文坛领袖的

胆识，“以文为戏”之说和对“贪常嗜琐者”守旧意识的批评，都是相当大胆的，对文体的变革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柳宗元，他兼采百家之说，出入儒释二教，思想比韩愈更加解放。他的许多文章，传奇小说的色彩是很浓的。沈既济、牛僧孺以及其他著名文士，从事传奇创作，都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表现。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促进文体的革新，使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创作，得以蓬勃发展。

就文学艺术的整体环境和各体文学的互相影响而言，除了“古文运动”对传奇小说的兴起具有促进作用以外，代表唐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诗歌，也为传奇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许多优秀的传奇小说，诗歌成份占有相当的比重，得力于诗歌抒情艺术的感染力，使传奇小说这一独特的文体，诗文相映生辉。此外，唐代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的成就，也丰富了传奇的艺术表现力。还有当时“杂戏”中的“市人小说”，也是传奇小说题材来源之一，如白行简的名篇《李娃传》，就是根据市人小说《一枝花》写成的。

唐代科举制度下所盛行的“行卷”之风，也是唐人传奇兴盛的原因之一。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

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其实用传奇小说或诗行卷的，都是进士科举的事，其他科的举子并没有行卷的风气⁽⁴⁾。王定保《摭言》十二《温卷》条云：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又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

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闾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可以想见，薛保逊的巨编，及其他填委于公卿之门的卷轴，大率是传奇小说。这种“行卷”的风气，中唐时最盛，也使主试人借机拉拢新进士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山东士族又强调门阀，反对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参与政权，这就形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党争又使一些人利用传奇小说的工具，来攻击中伤敌对的一方，在相当数量的传奇作品中，或明显、或隐约地反映了党争的内幕或某些迹象。晚唐咸通以后，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平息了，宦官与藩镇掌握政权，文坛也就逐渐冷落了。传奇小说与科举制度下“行卷”的关系日渐疏远，赋（诗笔）、判（议论）、传（史才）三合一的传奇体制也有所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在传奇小说中加入一段议论、藉议论表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作品主题思想的情况消失了，而议论一体，在考试科目中是很重要的，所以原来用以“行卷”的传奇，绝大多数在篇末都有一段议论。

二

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唐和盛唐，这是由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过渡时期，由写鬼神之“怪”，逐渐向传人事之“奇”过渡。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基本上沿袭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但是在志怪中又穿插人间言动，而且主要是写人间遭遇怪异之事或收藏灵奇之物，故事最后还是落脚于人世。作品中艺术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多起来了，描写比较具体，叙述故事发展过程也较详细，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

了。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以及武则天时代的作家张文成的《游仙窟》等三篇，在这个文言小说集中都辑录了。

《古镜记》作者自谓从汾阴侯生学，侯临终，以古镜赠度曰：“持此则百邪远人。”是为“灵物”。作者现身说法，叙述此镜果然灵验，如使寄居程雄家的婢女现出老狐原形、降伏芮城令厅前枣树心中大蛇、度弟王勣（绩）出游，持此镜降魔伏妖，逢凶化吉，道家思想相当浓厚，离生活真实较远。此虽承六朝志怪小说的余绪，而又记述作者家世、仕途及人事之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铺张藻饰，文章恢宏。用流畅美丽的古文写作小说，比之于六朝“粗陈梗概”的志怪小说，前进了一大步。人称王度“是一个由六朝志怪小说过渡到唐代传奇小说的起着桥梁作用的小说家”⁽⁵⁾。或称《古镜记》“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⁶⁾。这是有道理的。它的文字表现力，比六朝志怪小说有很大的提高，如写程雄家婢女鸚鵡之死，曲尽人情，悲恻感人。受《古镜记》的影响，唐人小说中以异镜为题材的有好几篇，如《异闻录·李守泰》、《博异志·敬元颖》、《原化记·渔人》、《三水小牍·元稹》等。

《补江总白猿传》，不著撰人，写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妖所窃，后生子询。据《直斋书录解題·小说类》云：“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猕猴，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孟棻《本事诗》，也有关于长孙无忌与欧阳询互相嘲谑的记载。明人胡应麟《四部正讹》始有以《白猿传》毁谤欧阳询之说，不足为信。早在晋人张华《博物志·狨国马化》中，就有猿妖盗人妇的故事，《白猿传》作者可能受此故事启发，而描述更加具体化、形象

化，志怪以传奇，乃是当时文人的风尚。唐人小说中，也有写猿仙化为美女与人间男子结为夫妇，生儿育女的奇事，如顾夔《袁氏传》，情节更为曲折动人。

《白猿传》在小说艺术上，已比《古镜记》有所进步，它用简洁优美的古文写传奇小说，在剪裁和布局结构方面，也不同于《古镜记》的平铺直叙。它善于围绕白猿盗欧阳纥之妻这一中心情节，展开矛盾冲突，描述欧阳纥寻觅失妻历尽艰辛，终于在深山洞穴找到妻子，并与妻子及众妇共商杀猿之计，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将故事推上欧阳纥杀猿救妇的高潮，让白猿在临死前吡吡诉说：“……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最后又稍带一笔：“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画龙点睛，突出了主题。但它毕竟还是唐人早期的作品，还不脱六朝志怪小说的怪异色彩。它在小说史上的作用是，促使从志怪小说过渡到传奇小说的进程加快了。

张文成早年作的《游仙窟》，是一篇带有自叙性的传奇小说，描述作者从泃陇奉使河源途中的一次艳遇，是封建文人轻佻浪漫生活的自我写照。“仙”，乃是当时对女道士或艳冶女子之称，所谓“游仙窟”，并高其门第，称女主人十娘是“崔女郎”、“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都是虚饰之词，美化其放荡行为，实不过逢场作戏，逛妓院罢了。用骈体文写小说，而时杂俚语，浮艳轻巧，笔调较活泼，但格调不高，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浪漫文人的生活作风。至于传说此篇为爱慕武则天而作，不足为信。《游仙窟》对唐人小说的发展，有一定作用。在题材的选择上，虽说是“游仙”，不脱志怪之气，实传人世间男女之情，更接近传奇小说的特点。在唐人小说中，它的篇幅最长，情节固然较简单，而铺叙藻饰，极其浪漫，对后来《李娃传》、《霍小玉

传》、《莺莺传》一类作品，也许有些影响。文气辞旨虽较卑下，却保留了不少唐人口语。以诗歌韵语相应和，酬唱吟咏，贯穿全篇，形式上受民间文学的启发。这种小说结构方式，对后世小说也有其影响。它是一篇写实主义的作品，通过具体的艺术描写，反映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物质财富较为充裕，文人思想和生活受封建传统观念约束较少的一个侧面。

唐人传奇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中唐时期，这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开元、天宝以后，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社会上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统治集团的腐化、政治的黑暗，朋党之争，藩镇跋扈，宦官擅权，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压迫与剥削。与此同时，随着两税法的实行，庄园经济和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的盛行和古文运动的兴起，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互相影响，更适合反映社会复杂变化着的生活、容易受市民阶层欢迎、雅俗共赏的传奇小说，在前一时期的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这时就蔚为大观，优秀作家与作品不断涌现，流传至今的名篇，绝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大都是士大夫，但所写的题材多半是有切身感受或耳闻目睹的事，有的作品还汲取了一些民间故事传说，所以写的比较真切感人，生动活泼，富有艺术生命力。这类作品所写的虽然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道化、狐妖鬼怪的故事，然而反映的生活面却比较广阔，触及到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都比较高，艺术上比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进步。以史才见称于时的沈既济，所作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冯媪传》、《古岳渎经》，沈亚之的《秦梦记》、《湘中怨解》、《异梦录》、《冯燕传》，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与科举和士族婚姻制度密切相关的婚姻爱情问题，成了这一时

期传奇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大致可分以下几类情况：

一是写士子与妓女的恋爱，最著名的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和白行简的《李娃传》，前者以悲剧结局，后者却是悲喜剧，它们触及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即士族婚姻制度的罪恶。

二是写遭逢乱世，情侣悲欢离合之事，如许尧佐《柳氏传》和薛调《无双传》。前篇记叙韩翃与柳氏破镜重圆的故事，唐时已盛传为佳话。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后，蕃将沙吒利恃功跋扈，奸淫掳掠，人民固然涂炭，文士亦不能保其妻子，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矛盾。后一篇以情节离奇著称，王仙客与刘无双，青梅竹马，情深意厚，无双之父刘震则“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致使好事多磨；更因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入京叛乱，拥朱泚为帝，皇室仓惶出奔，刘震陷贼，受伪职，故乱平后，刘震夫妇被处极刑；无双被籍没入宫。仙客与无双这一爱情悲剧，在当时是无法改变的。豪侠之士古生，乞茅山道士的药术，以救无双，与仙客偕老，离奇太过而失其真。

三是写闺中女子与士子的恋爱，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是元稹的《莺莺传》，其次是陈玄祐的《离魂记》。《莺莺传》就传奇小说的艺术水平而言，虽然不算很高，可是它的悲剧性情节，却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尽管作者从文过饰非、为张生辩护的立场出发，在后半篇对莺莺多有贬词，但是人们却仍然乐于传诵这个故事，对莺莺寄予极大的同情，为之作诗、词、曲咏唱者甚多，乃至出现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这样杰出的杂剧。《离魂记》的故事，在当时也是广为流传的。作者说这事是张镒的堂侄张仲觐告诉他的，意在故神其说，欲使人们信此虚构之事为实有，而没有意识到在小说中运用浪漫主义的虚构和想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庞阿》，对《离魂记》的构思有启发作

用。同类作品，还有《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玄怪录·齐推女》等。元人郑德辉根据《离魂记》传奇，改编为《倩女离魂》杂剧，男主角王宙显得迂腐，板着脸道学先生的脸训斥倩女私奔，这是受宋元理学影响的缘故，思想不象唐代青年士子那样解放、洒脱。

四是写神鬼妖仙与人恋爱的。具有代表性的单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李景亮的《李章武传》以及沈既济的《任氏传》等。这些作品，都写得细腻婉曲，形神逼真，情致动人。无论是龙女、王氏子妇鬼魂、狐妖任氏，虽然都是异类，却都富于人情。其共同特点是：藉虚幻的故事，描写人情世态，真切感人，反映了人世间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从各个不同角度揭示封建社会中婚姻、家庭的悲剧。

揭露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是这一时期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陈鸿以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封建统治者存在的问题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动乱，他写的传奇，不仅有小说艺术的美感，还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如《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等三篇，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共同点是：探究开元、天宝之际治乱的根源，借小说创作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在艺术上，《开元升平源》近乎实录，而另两篇则文情并茂，摇曳多姿，实为传奇小说中上乘之作。

中唐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非常激烈。传奇小说也被利用来攻讦政敌的工具。托名牛僧孺而实为李德裕门人韦瓘撰写的《周秦行纪》，便是李德裕党人藉以毁谤牛僧孺的，意在罗致牛僧孺犯上悖伦之罪，而唐文宗却一笑置之，根本不予追究，这也说明当时文化艺术政策的开明。柳理《上清传》，写贞元间宰

相窆参遭陆贽陷害，被贬致死，其侍婢上清被籍没入宫，上清见机而行，向德宗伸冤，得以昭雪。这事不符合历史，司马光斥其事不近情理。但作为小说，原不能以史学家的标准去衡量，从反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其认识价值。

这一时期，除了大量单篇传奇以外，还出现了一批传奇小说集。牛僧孺《玄怪录》，据说是他进入仕途前用以“行卷”的作品。文笔雅洁，想象丰富，内容诚如书名所示，玄而且怪，往往在篇末把幻境点穿，是一种怪诞性的娱乐作品；也有少数作品思想内涵较丰富、艺术上较优美，如《崔书生》，写仙女——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与志诚老实的书生恋爱结婚，但由于崔母的干涉，以悲剧告终，反映了封建家长制对青年婚姻幸福所起的破坏作用。《郭元振》写为民除害的豪侠行为，女子不甘作父母的牺牲而情愿相从除害英雄郭元振，颇有新意。《玄怪录》更明显地表现出作者有意识地创作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评述《玄怪录》时说：“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有意让人知道是艺术创作，是作者的虚构幻想，即艺术上的“诡设”，这与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要人们相信鬼神之必有，有着创作动机的根本区别。

李复言仿效《玄怪录》，公然题其所著传奇集为《续玄怪录》，其玄妙怪异比《玄怪录》有过之而无不及，受佛家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和道家求仙问道、白日飞升的影响也更明显。有些作品的意境胜于前者，如张逢化虎复仇、赤绳系足定姻缘、李靖代龙降雨等，想象奇妙，带有某些民间传说的色彩。薛渔思的《河东记》，序云：“续牛僧孺之书”，所记也是玄虚怪异之事。此外，张读《宣室志》，也记述鬼怪灵异事迹，书名即以汉文帝召贾谊于宣室问鬼神事而取的。受佛、道影响较明显，有些故事虽

荒诞不经，但也有不少志怪性的佳作，情节曲折，描写细致，形象生动，性格较鲜明，对后来《聊斋志异》有一定影响。写人与鬼狐的爱情婚姻，亦富人情。而狐妖化为术士为人治病，寓意深远。牛肃《纪闻》，仿效《玄怪录》中“元无有”等篇的标题，称“张无是”、“李虚”、“王无有”、“苏无名”之类，乃是娱乐性的作品；也有某些轶事，具有史料价值，如《吴保安》，宋祁、欧阳修撰《新唐书》，采用列入《忠义传》，吴保安为友情谊，舍己救人，全力以赴，历尽艰辛，感人至深，文笔也流畅优美。薛用弱《集异记》，也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写隋唐间各类人物的奇闻异事，以写实为主，间杂志怪性的浪漫色彩，文笔雅丽，清新隽永。如《集翠裘》通过狄仁杰与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赌赛双陆技艺之事，刻画了狄仁杰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品格，他敢于当着武则天的面夺走珍贵的集翠裘，出了宫门就将此裘给自己的仆人穿上，说明狄仁杰之意不在于得裘，而是煞权贵宠臣的威风。《蔡少霞》这篇“奇作”，则反映了唐代士大夫崇尚修道的风尚。写道士现法护身故事的《徐佐卿》，揭露方士刘元迥以炼金术行骗的《刘元迥》，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崇道的社会风气。《奚乐山》写车工以自己劳动所得救助饥寒交迫的百姓，这是一个崭新的题材。《王之焕》表现王昌龄、高适、王之焕三个著名诗人在旗亭画壁、争强好胜的文人轶事。这些作品，为后来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晚唐五代是传奇小说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时的传奇创作，既有所变化创新，而总趋势却逐渐衰微。

随着晚唐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宦官擅权、藩镇跋扈，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生活很不安定。思想意识也较复杂、混乱，中上层人物崇道佞佛、信神信鬼的风气更为盛

行，而广大劳动人民不堪忍受唐王朝的压迫与剥削，终于揭竿而起。黄巢起义虽然于公元883年失败了，但是唐王朝也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割据势力互相混战，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年），被大军阀朱全忠取而代之，唐亡。晚唐天下大乱的社会情况和人们苦闷忧郁的心灵，对传奇作家的主体意识及其创作自然要产生影响。这个时期的传奇小说，就思想倾向而言，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歌颂豪侠的仗义行为及其神奇力量，维护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体现人民渴望制止战乱的善良愿望。杜光庭《虬髯客传》，塑造了红佛、李靖、虬髯客“风尘三侠”的动人形象，行动的诡秘神奇，性格的豪爽侠义，是典型的中国式侠义小说。写“三侠”之奇，意在突出李世民之异，原想争夺天下的虬髯客，见了这位“异人”，就主动退出角逐，而告诫李靖尽心竭力扶佐“真主”。主要思想是说明帝位天命，非人力所能竞争，从而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袁郊《甘泽谣·红线》，赞美红线以神奇的豪侠行动，制止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妄图吞并潞州节度使薛嵩地盘的战争。裴铏《传奇·昆仑奴》则写昆仑奴磨勒仗义抑强扶弱、成全崔生与红绡妓的美事。同书《聂隐娘》也是著名的豪侠小说，聂隐娘受其师的指使，刺杀恶贯满盈的坏人，也是大快人心的事，至于聂隐娘偏重个人的恩仇观念、容易被人收买利用，也是一般豪侠的弱点。

二是写求仙问道、在乱世中幻想极乐仙境、追求长生不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传奇》所写，就大都是神仙恢谲之事，裴铏对道家学说很有研究，故在其小说创作中自然要宣扬道家的出世思想，但是在艺术上也开拓了新奇的幻想境界。例如《裴航》篇，关于蓝桥玉兔捣药的故事，想象奇妙动人，裴航与仙女云英